

平台伦理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 及其矫正对策研究

唐任伍 马志栋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我国平台经济高速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但是,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平台垄断、数据安全、平台剥削、数字鸿沟、伤害性反智性言论、鲍莫尔病等一系列平台伦理问题,从行业层面、制度层面、参与者层面和技术层面侵蚀着平台的健康发展,对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具有很大危害性。平台伦理的产生有着行业、制度、参与者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对症下药,推进平台行业自律自治、完善平台治理体系、增强平台参与主体的权责意识、加快平台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促进平台健康规范发展。

[关键词] 平台伦理;数字经济;数据安全;数据垄断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24.02.005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24)02-0059-13

中国平台经济发展迅速,基于市场化改革的丰硕成果、庞大的人口规模、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超大规模市场等发展优势,再加上国家的鼓励政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平台经济国家之一。平台经济作为一种以大数据为核心资源、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支撑的新业态,具有规模效应、长尾效应、范围经济、网络效益、大数据分析等特征,能够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增长效率、降低生产者成本、增加消费者剩余、规避经营风险,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作用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存在风险,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存在短板,监管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也较为突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2]要“妥善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3]可见,应对平台伦理带来的挑战十分重要。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平台经济在时代发展大潮中应运而生,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间,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为就业创业提供了新渠道,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支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18ZDA012)

[作者简介] 唐任伍(1953-),男,湖南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民生理论、管理思想史。

征程上大有可为。平台企业坚定信心向前看、练好内功,努力破解成长中的烦恼,而制度供给者政府,为平台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4]但是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潜伏着平台垄断、平台歧视、数据安全、平台剥削、数字鸿沟、虚假信息、鲍莫尔病等一系列平台伦理问题,从行业层面、制度层面、参与者层面和技术层面侵蚀着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思考人类如何与技术和谐相处的平台伦理问题不仅关系到平台经济、数字技术的发展,还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美好生活,对日益昌盛的平台伦理进行研究,找到治理平台伦理失范的方式,成为数字化时代一个主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关于平台经济及其伦理问题,国外学者从数据垄断、数据滥用、劳资关系和平台治理等多个方面^[5],以及不同的维度进行了探讨。关于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Sadowski(2020)^[6]认为平台能够利用生产条件的所有权获得租金,成为食利者,这些新型食利者依靠平台的数据优势与技术优势,通过提供技术、供给服务、控制准入权来获取垄断利润,食利平台代表了食利资本主义的演变与扩张。Birch等(2020)^[7]以亚马逊这一平台企业为例,阐述了知识垄断问题,认为知识垄断企业通过对平台系统中其他参与者的掠夺来获取知识垄断租金,形成基于掠夺性关系的价值再分配。关于平台滥用数据问题,Markus(2022)^[8]认为平台为监视资本提供了场景,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平台资本,监视资本能够提取和分析用户数据,并将其转换为预测数据出售给广告商,广告商利用这些预测数据在同一平台上精准发布具有针对性的广告,用户与这些广告的互动产生了更多的数据,这些数据进一步反馈到用户未来行为的预测过程中,不断循环。在这个周期中,监视资本为用户数据的滥用、积累和商品化提供了工具。关于平台对平台劳动者的剥削,Rahman和Thelen(2019)^[9]认为平台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提高投资者回报和消费者福利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Staab和Nachtwey(2016)^[10]认为平台通过加强对劳动的控制,实现对劳动力剥削的新形式,数字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从人类劳动中榨取价值的基础之上,代表着资本主义在利用数字技术方面正在走向成熟。Eduard(2020)^[11]认为平台经济雇佣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并且利用算法加深了对平台劳工的控制,从而将风险从资本方转移到劳动力方,导致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环境不同,平台经济发展面临的伦理问题共性之外个性差异很大,国内学者研究的视角也有差异。一是偏重于对平台伦理的宏观分析,如罗喜英和唐玉洁(2022)^[12]基于ESG框架,将平台企业面临的数字伦理困境划分为环境、社会和治理三类,然后基于个人、组织和环境构成的三维框架分析平台企业数字伦理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在企业、行业和法律层面重塑平台企业数字伦理。余达淮和金姿姝(2021)^[13]认为,对数据、算法等技术要素的阐释是理解平台伦理的微观视角,对平台企业的责任、目的在伦理视角上进行审视,主要是厘清“公私之分”和“义利之辩”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内涵。二是关于平台垄断,程恩富和王爱华(2022)^[14]认为,平台经济天然具有从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趋势,其引发的垄断问题对传统反垄断规制方式的适配性形成挑战;许丽(2022)^[15]认为,平台通过实施“二选一”排他性交易来排除或限制竞争者参与市场竞争,侵犯了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增加了数据垄断的风险,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关于数据滥用问题,朱建海(2021)^[16]通过剖析“大数据杀熟”行为来阐释平台企业对用户数据的非法收集与滥用,提出平台企业会为了自身

利益利用大数据技术广泛收集用户数据,并利用熟客信任实行价格歧视。四是关于平台从业者的劳动保障问题,余少祥(2021)^[17]认为,由于立法滞后等原因,我国平台经济劳动者保护陷入困境,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劳动者缺乏劳动保障、劳资权利严重失衡;王伟进等(2022)^[18]通过研究提出,平台经济从业人员普遍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平台企业在劳动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平台用工法治建设严重滞后。

基于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平台伦理相关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到,国内外对平台伦理问题的研究尚停留在将平台伦理作为数字伦理的一个方面,诸如数字垄断、数据滥用、隐私保护、平台剥削的某一个方面,尚未形成对平台伦理产生的原因、表现以及如何治理的系统化、整体性分析研究。因此,深入探究平台伦理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危害后果,从而提出科学的矫正对策,对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二、平台伦理的表现形式及危害后果

平台将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融合,塑造了新的时空结构,建立了网络世界。平台既具有社会性(sociality)和聚合性(connectivity)的自生产特点,又具有分享性、扩散性的他赋能特点,平台用户不仅能创建自身信息,还会传播转发他人信息,这会导致一些信息能够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迅速蔓延。平台成了一个双向加速器,一方面增强了人们之间理性对话的潜能,为信息传播和民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放大了人们之间的偏见、愤怒与仇恨,传播了大量的虚假信息,甚至引发社会动荡。^[19]由于数字技术支撑的平台本身自带匿名性、虚拟性、实时性、交互性特征,在道德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平台异化,超越时空,造成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模糊,传统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于是各种表现形式的平台伦理现象产生。

(一)平台垄断:平台企业通过数据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与钢铁、电力、交通等传统行业的垄断不同,平台的垄断行为主要是数据垄断。在互联网时代,数据被称为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同样重要的生产要素,平台为了争夺市场,抛弃平台是公众的理念,奉行“流量为王”、“我的平台我做主”,利用自身的数据、算法、算力优势,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并加以滥用,以达到排除或者限制其他经营者与其竞争的效果。^[20]平台的数据垄断行为虽然巩固了其行业地位,但阻碍了市场竞争,恶化了营商环境,给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带来了威胁。平台通过数字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二选一”“算法合谋”“自我优待”等。

以“二选一”为代表的限制或拒绝交易行为,是平台进行排他性交易的一种形式,处于优势或核心地位的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利用数据优势或技术手段,迫使商户只能与自己合作,不能与其他功能相似的数字平台等竞争对手合作,进而将未获得合作机会的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以此巩固自身竞争优势。“二选一”是人为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不仅会损害其他数字平台企业和被限制商户的经济利益和交易机会,还会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机会,并且会恶化营商环境、阻碍技术创新,制约平台经济发展。

通过“算法合谋”形成数字化的卡特尔,是指两个及以上的平台经营者,在特定市场中共同利用算法优势限定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数量,进而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20]平台利用

其数据资源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等优势,往往不需要经过明示协商沟通或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就能轻而易举地利用算法、大数据等工具隐蔽地达成合谋,促使横向与纵向垄断协议的达成与实施。算法合谋各方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实时调整商品或服务价格,进而动态性地巩固垄断协议。平台算法合谋与传统垄断协议相比,更具动态性、隐蔽性、智能化的特征,这种数字化的卡特尔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损害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自我优待”行为,是平台利用数据、算法算力优势,将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内容放在更为有利的位置,以增强自有商品或服务的竞争优势。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操控商品信息的显示顺序或者选择性地向消费者展示商品信息,对自营商品和其他企业商品进行区别对待,进而做出对平台自营商品有利的措施。^[21]例如,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搜索引擎将自身产品或合作企业的相关产品等信息展示在最前端,在用户检索相关信息时,展示在最前的相关内容对于用户来说并不是最好的或最合适的。“自我优待”行为明显存在对于竞争者的歧视,恶化了营商环境。

(二)平台歧视:算法偏见引发不公平和价格歧视

人类的偏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融入数据和算法过程,技术本身并不是中立的,它嵌入了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价值偏向与立场。因此,不同的数字平台往往基于不同的商业或政治目的。平台经营者以先在偏见、技术偏见和突发偏见,在平台架构和算法中嵌入自身的价值观,然后平台根据消费者的数据资料信息,在算法的牵引下将消费者分成三六九等,为其提供不同数量或价格的产品或服务,或者是为其提供截然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人为引发不公平或歧视性的结果,从而产生公平性、身份污名化和隐私保护的伦理问题,“平台责任”也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以大数据杀熟是典型的平台价格歧视行为。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以数据垄断为基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算法、算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对用户的消费行为、消费习惯和价格敏感度等进行大数据分析,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进而针对不同用户收取不同费用或实施差别待遇的行为。大数据杀熟行为是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消费剩余进行剥夺的体现,不仅给消费者的权益带来侵害,而且弱化了企业质量投入动机、增加了管理难度和信息泄漏风险。有关大数据杀熟的案例,在国内诸多互联网平台上屡见不鲜,集中出现在网约车、在线旅游、在线住宿平台等领域,平台通过对熟客进行数据分析了解其消费喜好,在熟客对平台形成一定的品牌黏性和消费刚需后,对熟客实施较高价格。

(三)数据泄露:用户数据过度采集、滥用造成安全风险

平台为优化用户体验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但这种高度定制内容所带来的便捷和效率是以对用户个人数据的实时跟踪和收集访问为代价的,用户数据成为平台的优质资产,平台利用用户个人数据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也通过超大规模的数据挖掘、数字监控和算法分析,利用这些数据来控制用户,让普通公众在数字世界里“裸奔”,甚至把这些数据滥用于商业来往以牟利,从而引发用户信息泄漏风险,只有极少数群体才能在数字领域获得隐私保护。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2年下半年有34.1%的网民表示在上网过程中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其中遭遇个人信息泄露的网民比例最高,为19.6%。^[22]对于以数据为生

产要素的平台企业,用户数据已经成为一项具有重要地位的商业资产,这些数据面临着过度采集和泄露的安全风险,不仅侵害了平台用户的隐私,损害平台用户个人的财产以及人身安全,而且阻碍了平台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国家安全。

平台通过各种手段、途径和方式对用户信息的过度采集,有些可能由平台用户自愿提供,有些则可能是平台经营者通过购买或监测消费者行为非法取得。平台用户有权决定是否提供个人数据以及提供数据的范围,但平台企业为了商业利益往往过度采集用户信息,用户无从知晓其个人数据是何时被平台获取、何时被平台处理后加以使用的。某些平台 APP 的使用采用霸王条款,强制用户必须同意所谓的用户协议,要求用户提供通讯录、地理位置等个人信息,若用户不同意该协议,就不能使用此平台 APP;某些平台企业为了方便后续商业利用用户的个人信息,后台监测平台用户的浏览记录、购买记录、搜索记录,通过跟踪平台用户的行为过度采集用户个人数据。

平台数据泄露会造成对用户隐私更为严重的侵害,由于外界侵入侵害、黑客攻击,导致安全漏洞,引发数据泄露,或者平台企业轻视用户数据保护,甚至故意泄露用户数据,使得用户隐私遭受侵害,导致经济和精神损失,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四)平台剥削:平台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难以保障

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劳动者的工作形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创造了具有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性质的灵活就业工作模式,使工作结构由“企业+员工”模式逐渐向“平台+零工”模式转变。新型工作形式有别于传统的雇佣形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灵活性和自主性,模糊了原有的劳资二元关系,导致现有法律体系无法覆盖平台经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新需求,许多平台经济从业者面临高强度工作压力和超长工作时间的过度负荷,造成“平台剥削”。

从绝对剩余价值角度来看,平台经济从业者工作时间过长。平台的在线化工作模式使得工作与闲暇时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从业者的休闲时间在无形中被无偿占用,导致了工作时间的延长。例如,平台从业者在闲暇时间仍然需要回复工作中的信息或邮件,生活中存在大量介于工作和闲暇之间的等待时间,超长待机使其休息权受到侵害。^[23]平台劳动者为获取更高绩效工资,易受到平台激励诱导而延长工作时间,如网约车司机为获取夜间打车补贴增加夜间接单数量。

从相对剩余价值角度来看,平台从业者面临高强度工作压力。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等工作模式使得平台企业能够以更低的门槛大量招工,同时通过评级、认证等手段增大劳动者内部竞争,带动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强度。平台为了追求极致效率,利用大数据、算法等技术精准输出派单,增加了平台劳动者工作强度,固化了对平台劳动者的支配地位,如外卖平台网约骑手的拒单率会影响将来的接单率,这种工作模式淡化了网约骑手的接单意愿,从而导致其必须全力完成平台指派的任务。

从收入角度来看,平台从业者劳动报酬容易受到侵蚀。平台从业者工作过程具有弹性和间歇性,没有量化的工作任务,不适用法定的月最低工资和小时最低工资制度,也没有对从业者收入基准的相关监管约束,导致平台企业独断专行。^[23]劳动关系网络化、算法黑箱、数据垄断等特征,使平台企业有能力挤压劳动价格,导致平台员工的劳动报酬受到侵蚀,而平台企业

的算法霸权使得从业者不具有话语权,议价能力弱,平台从业者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劳动权益难以保障,遭到“平台剥削”而无从申诉。

(五)数字鸿沟:平台经济数字红利难以惠及全体人群

数字作为平台企业的核心要素,其复杂性、隐蔽性使得数字素养较低的人群难以享受平台经济的数字化红利,产生数字素养两极分化、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形成区域之间、人群之间在利用和应用数字技术方面,以及数字可及性和数字使用性方面,产生由数字鸿沟引致的平台鸿沟,平台的数据垄断、算法技术垄断行为进一步阻断数据共享,加剧了这种鸿沟,导致数字化红利分配不公正,阶层进一步分化,社会公平正义遭到破坏。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导致东部、中部地区平台经济发达,并对中小平台企业产生虹吸效应,加剧了平台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数字鸿沟在城乡之间的体现更为明显,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1.9%,较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低出21.2个百分点,农村地区的非网民规模达到3.44亿,占比为55.2%,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19.9个百分点。^[22]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构成了一级数字鸿沟,村民数字化能力不足构成了二级数字鸿沟。

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导致平台经济的数字化红利分配不均,中国数字化进程加快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共同加剧了代际数字鸿沟。由于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程度不完全、数字技能学习能力下降、智能手机使用率低,限制了老年人享受平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相关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截至2022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为37.4%,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17.6个百分点。^[22]

平台数据垄断行为引发了新型数字鸿沟,表现为数据使用的不公平。从宏观层面表现为互联网平台与非互联网平台组织间的鸿沟、互联网垄断平台与一般平台之间的鸿沟;从微观层面表现为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劳动者之间的鸿沟、平台技术精英与技术劳工之间的鸿沟、平台数据型劳工与受技术支配的传统行业劳工之间的鸿沟。^[24]平台企业封闭数据、减少数据流动造成的新型数字鸿沟会导致平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数据孤岛,致数字化红利分配不公,造成阶层分化。

(六)虚假信息:伤害性反智性言论造成群体极化

数智化平台匿名性、隐蔽性特征便利了公众的自由表达,但同时也放大了不同群体的偏见和分歧,使其为民粹主义、反智性、虚假性言论的蔓延提供了土壤。平台作为公共话语场所,为人们“用拇指发言”提供了方便,使得那些习惯于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来判断取舍、发表反智反理性的极端思想和言论的人成为可能,相反,理性交往的能力遭到削弱,严重阻碍了沟通正义,同时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冷漠与仇恨,大量的反智性和虚假性信息得到充斥。

诚实是人类的基本美德,而当今一些平台抛弃传统媒体那种对传递信息严格把关的做法,导致假新闻、伪新闻、虚假信息等大行其道,为谣言、虚假、恶意信息的迅速传播提供了环境。

平台传递的很多信息是真实和虚假的混合体,有的故意将一个正确事实放在一个精心编制的错误语境下,或者给一张照片标注与之不符的虚假说明,^[19]信息失真、另类事实、傀儡账号或谣言等对个人或团体声誉造成了严重伤害,影响公众对真善美的判断。

平台基于算法工具的特定导向,容易产生回音室效应,公众根据自身利益考量和个性化的兴趣爱好、价值理念、目标利益,选择性接收与传播信息,形成以观点和价值为纽带的众多对立群体,人群之间极化为愤怒、仇恨和偏见,呈现出对立和撕裂的“圈子化”。

(七) 鲍莫尔病:数字化转型缓慢的传统线下企业遭受挤压

鲍莫尔病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76年提出,又称鲍莫尔成本病,指某个或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放慢,因为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不断上升。^[25]宏观经济中劳动生产率正增长的进步部门单位产品成本将保持不变甚至下降,而劳动生产率无增长的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将不断上升,若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完全无价格弹性,该部门不仅不会萎缩,还会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引起劳动力由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致使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率放缓。进步部门通常以制造业为代表,由于具有高效率的机器设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停滞部门以服务业为代表,服务过程需要服务提供者直接参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

鲍莫尔病的存在导致绝大多数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后期效率低下、增长缓慢,主要原因是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其难以利用新兴的机器设备实现规模化生产。但是,以数字技术为内核的平台经济的发展产生蒲公英效应,提高了传统服务业的数智化水平,推动了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相反使得传统的制造业难以数字化转型,实体经济效率下降,单位成本上升,虚拟经济快速发展,脱实就虚的风险加大,中小制造业衰落趋势明显,新的“鲍莫尔病”不可避免。

三、平台伦理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平台伦理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平台经济自身特征的因素,也有制度、参与主体、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一) 行业层面:平台自身特点存在数字伦理隐患

数据是平台的核心要素,数字技术是平台的主要支撑。而数字技术具有长尾效应、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虚拟性、大数据元素丰富等特征,这就为平台伦理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首先,平台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一般认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自然垄断产生的原因,平台经济天然具有网络效应、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特征,平台垄断一定程度上是由平台经济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网络效应是指产品或服务对用户价值随着用户数量增加而增长的现象,^[26]增加社交平台的使用可直接提升社交平台对需求方的价值,即人们所说的赚取流量,成为直接网络效应;而增加使用购物平台可提升产品对供给方的价值,成为间接网络效应。在直接和间接网络效应下,用户数量的持续增多,网络效应越来越强,形成自然垄断。由于单一数据的低价值性与海量数据的高价值性,数据要素的积累与生产利用呈现规模化趋势。因此,平台具有典型的规模效应。平台企业之间能够更容易地连接,有效降低了各方获取信息的难度与成本,^[27]平台企业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总成本低于分别生产各种产品的成本之和,生产多

种产品的平台企业比生产单一产品的平台企业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随着用户增加,边际成本逐渐递减,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平台具有范围经济的特征。

其次,平台运行具有虚拟性。与传统的交易模式相比,平台以网络交易为主,在虚拟场中交易,这种特征是导致信息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平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收集和产生大量数据,订单信息、金额信息、用户个人信息、评价信息等数据很容易被传播、泄露,平台经济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以及数据利用过程中都存在信息安全的隐患。

最后,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独特。相较于传统劳动关系,平台的“不完全劳动关系”用工是从属性较弱的用工形式,平台劳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决定自己工作的时间、地点和工作量,传统的薪酬机制被改变,与传统按期支付报酬的形式不同,劳动报酬以计件工资或业绩考评定酬的形式体现,对于临时性的工作,即刻兑现的特点尤为突出。但是,“不完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不明确,导致平台员工处于弱势地位、劳动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平台“不完全劳动关系”并不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解放,而是加深了对劳动者劳动过程和控制时间的控制。

(二)制度层面:平台治理体系存在缺陷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时代的新业态,由于其自身特征和形态的特殊性,以规制传统业态的理念和方式去规制平台经济会产生多方面误区。

一是平台经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平台经济发展迅猛,但缺少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相关的专业性法律,相应的法律体系滞后、执法依据不足。平台垄断、平台数据安全、平台压榨劳工行为看似有法可循,实则漏洞繁多。反垄断法是以传统经济为依据制定的,针对平台经济垄断行为的适用性有限;对于平台垄断行为的认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很难应对基于数字技术衍生出来的平台垄断问题。适应平台经济新型就业形态的劳动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现行的劳动法规主要针对传统经济科层化组织用工模式,平台用工、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等就业模式的法律规范不足;平台员工与平台企业被认定为劳动关系才能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平台用工的新特征冲击了劳动关系的认定。

二是平台监管机制不健全。平台伦理具有复杂性、隐蔽性等特点,对传统的监管模式构成了冲击。以传统工业经济为依据建立的监管机制以事后惩戒性监管为主,面对数字技术丰富的平台无能为力,有效的事前和事中监管缺失。由于平台的特殊性,其垄断和数据滥用行为具有技术复杂性、隐蔽性和虚拟性等特点,增加了对于平台的监管难度,难以对平台进行全方位监管。

三是平台从业者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以标准劳动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劳动者只有通过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劳动关系,才能享受社会保障权益。由于平台从业者没有固定的单位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满足平台从业者“不完全劳动关系”的需要,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等工作模式下的从业者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不确定,这种非全日制的平台工作模式增加了为其提供社会保障的难度。

(三)参与者层面:平台各方参与者权责缺失

平台经济是一个多边市场,伦理问题的产生并不只是一方责任,而是多方参与主体权责淡薄造成的。

平台经营者责任缺失。随着平台经济规模扩大,平台经营者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断增加,但一些平台企业发展壮大以后,没有正确意识到自己对所掌握的数据资源的保护责任,利用资本和规模优势兼并或收购其他小型平台企业,产生数据垄断,并对其竞争者展开不公平竞争;一些平台经营者运用数字技术来掩饰对平台员工的剥削,并利用法律漏洞来逃避责任。

平台设计者和程序员社会责任意识较弱,缺乏对用户期望的认识,在设计算法时很少考虑用户的隐私期望,忽视算法对用户隐私的侵犯,导致平台设计者和程序员开发出与社会预期不符的算法,造成严重后果。更有甚者,设计者与程序员在编写算法时,往往将自身的价值评估标准与偏好融入逻辑框架和编写代码之中,优先考虑显性的效率与利益,而忽视难以量化的公平。

平台用户自我保护意识缺乏。由于平台经济交易主体的虚拟性、交易形式的多样性和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平台用户难以发觉自身权益受到的损害,导致其维权意识薄弱。虽然平台用户有权对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但平台用户权益受到损害时,话语权微弱,缺乏运用法律来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增加了对平台的监管难度,助长了平台垄断、滥用数据等失范行为的势头。

(四)技术层面:数字技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平台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尽管近几年中国数字技术发展迅猛,但仍然面临“卡脖子”难题,尤其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原始创新不足,导致平台经济发展后劲疲弱。平台经济的发展以大数据、5G网络、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石,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应用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因此平台经济面临数字鸿沟、鲍莫尔病等数字伦理问题。

第一,数字技术面临“卡脖子”难题。当前我国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呈现出应用端成熟、创新端和基础端薄弱的现象,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方面仍有很多不足。^[28]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更多是依靠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我国大规模的人口红利,平台企业在基础性、关键性软硬件数字技术领域存在不足。例如核心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等关键软硬件数字技术我国仍然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仍然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较大。

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存在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不同群体间存在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是数字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数字教育等数字公共服务供给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此外,由于制造业和农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大、回收慢,平台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不足,制造业、农业等难以数字化转型的领域数字化水平较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造成了行业间的数字鸿沟。

第三,数字技术人才匮乏。人才是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主力军,数字技术人才匮乏影响了我国信息技术的研发和突破,阻碍了平台经济的发展,放慢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脚步。一方面,数字技术研发人才的培养周期长,培养速度低于当前平台经济发展的速度,平台经济面临数字技术研发人才供不应求的问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人才与数字基础设施不匹配的问题也较为突出,这种不匹配性与不适应性尤其体现在区域间数字鸿沟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不仅要考虑数字基础设施的供给,还要考虑是否有相匹配的劳动力使其有效发挥作用。^[29]

四、平台伦理的系统性治理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平台发展日新月异,并已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很强的智能行为和生命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塑造了一种新型权力和生活方式,为人类提供了各种新的可能性,但平台也在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发生改变人的社会属性,给社会带来了伦理道德风险和挑战。因此,平台伦理建设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为政府、市场、平台企业和公民共同的责任。推进平台自律自治、完善平台治理体系、增强平台各参与主体的权责意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进而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一)推动平台的自律自治建设

数字平台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一种新形态,有责任建章立制,运用“智能算法+人工干预”等方式控制言论,有义务删除各种伤害性和反智性言论,防止新的网络精英对舆论的控制。数字平台应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增加边缘性群体的可见度,媒介平台更要承担起弘扬社会正能量、推送更多的正能量信息和主流价值观内容的责任,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正是因为平台“独具”的自然垄断、虚拟性、去劳动关系化的特点,要对平台进行系统性治理,因此要矫正平台伦理问题,首先要加强平台的自律自治,从源头上规避平台伦理问题的发生。

加强平台自律的约束。行业自律是介于法律与商业道德之间的管理工具,在平台治理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与法律相比,行业自律约束力弱,但可以适时地进行调整;与商业道德相比,行业自律约束力较强。因此,要制定高于法律要求且符合平台特点的自律协议,对于遵守自律协议的平台给予优待,对于违反自律协议的平台给予惩罚,建立起平台声誉评价机制约束平台企业行为。

完善平台自治的机制。指导平台企业构建清晰、合理的内部合规组织架构,建立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监督有力的内部管理体系,在平台企业内部自查自纠伦理问题。鼓励平台企业建立行业协会、平台联盟进行自我管理约束,激发平台的内生积极性,对本行业进行统一规范管理,相互合作,发挥龙头平台企业“领头羊”作用,构建起平台良性发展生态。

强化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驱动下,用户、信息、服务汇聚在平台上,平台因之获得了其他传统企业所不具有的“中介权力”“制约权力”等平台权力,具有了新型“守门人”(gatekeepers)定位,因此也需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平台企业应积极配合反垄断监管,主动承担保护平台用户隐私的责任,不通过数据垄断的方式滥用平台权力,进而促进平台经济生态共同繁荣。平台经济更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将自身发展与普惠民生、公共服务、志愿慈善活动紧密相连,运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扩大开放普惠服务领域数字化服务的创新及应用。

(二)完善平台治理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

平台伦理问题反映出相关法律制度、监管机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因此,完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是矫正其伦理问题的制度路径。平台信息内容良莠不齐,深度伪造、智能算法等被滥用,人为制造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的现象屡见不鲜,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带来挑战。因此,推进平台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实现算法分级分类安全管理势在必行。法律法规对平台强约束力,前瞻性地出台平台伦理治理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才能达到系统性治理的效果。

完善平台的监管机制,强化对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滥用数据行为与压榨劳工行为的监管力度,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对平台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加强监管;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建立起公众参与平台活动的伦理规则,对利用平台作恶、发布反智性观点和言论的信息及时发现,精准治理,建立全平台通用的黑名单制度,培养和发展平台诚实、耐心、宽容、平等和富有同理心的交流美德。

完善平台劳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平台劳工的新特点,促进社会保障制度与平台经济用工方式相适应,明确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法律身份,建立与平台用工形式相适应的职业保障制度,创新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提升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社会保障科学性与精准度。

(三)提高平台参与主体的权责意识

平台伦理问题的产生与平台经营者、平台程序员、平台用户多方参与主体相关,增强平台参与主体的权责意识是矫正平台伦理的重要对策。

增强平台经营者的权责意识。平台经营者在自觉遵守反垄断法的同时,加强国际交流,推动平台与国际接轨,与世界上先进的平台企业同台竞争。尤其是大型平台,要成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头羊”,在自身发展中主动帮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维护用户隐私,保护平台零工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营造良好的平台发展环境。

增强平台程序员的社会责任意识。算法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由人设计出来的,算法权力与其设计者所承担的责任之间的不对称将导致算法偏见的普遍存在。因此,矫正平台程序员权力与责任不对称的现象,确保算法使用不违背法律规定及道德准则要求。

增强平台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平台用户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是有效规避平台伦理的重要因素,不随便提供个人信息,从源头上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同时承担对平台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社会监督的责任,运用新闻媒介、社会舆论、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保护自己,促进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

(四)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

由于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字技术人才匮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平台发展中面临着“卡脖子”技术难题、后劲不足的风险。因此,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提高平台的大数据容量和算力、算法的技术含量,拓展平台边界,成为矫正平台伦理的科技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30]。平台数字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抓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海量数据优势,补齐与平台经济相关的数字技术短板,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的创新布局,开发算法技术与反算法技术互相制约、人工智能技术与反人工智能技术等互相制约型技术,加强识别技术的研发,构建识别平台伦理风险的技术体系。

数字化人才是平台发展的基石,不仅通晓算法研发,同时还具有工商管理、跨界协同的能力。因此,培养大批具有数字化新思维、新视野、新理念、新格局,了解数字化管理运营的新模式、新场景、新流程、新要求的复合型平台人才,是推动平台经济理念变革、模式变革、流程重构

的关键,为平台可持续发展注入智力资本。

加强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共享水平,促进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稳步构建智能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推进智慧教育、数字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建设,缩小区域间、群体间的数字鸿沟。

参考文献:

- [1]唐任伍,马志栋.平台经济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的内在机理、实施路径与对策建议[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3,(04):31-40.
- [2]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N].人民日报,2021-03-16.
- [3]习近平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N].人民日报,2023-11-09.
- [4]李强主持召开平台企业座谈会[N].人民日报,2023-07-13.
- [5]秦臻.国外学者论平台经济[J].国外理论动态,2023,(01):169-176.
- [6]Sadowski J.The internet of landlords: Digital platforms and new mechanisms of rentier capitalism[J].Antipode,2020,52(2):562-580.
- [7]Birch K, Word C, Tretter E, et al. A story of accumulation through intellectual rentiership and predation [J].Competition Change,2022,26(3-4):436-466.
- [8]Markus K. Surveillance capital and post-fordist accumulation: Towards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surveillance-for-profit[J].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22,20(1):18-29.
- [9]Rahman S K ,Thelen K .The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J].Politics Society,2019,47(2):177-204.
- [10]Staab P,Nachtwey O. Market and labour control in digital capitalism[J].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2016,14(2):457-474.
- [11]Edward W. The uberisation of work: The challenge of regulating platform capitalism. [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20, 34(4):512-521.
- [12]罗喜英,唐玉洁.平台企业数字伦理困境与重塑[J].财会月刊,2022,(03):132-138.
- [13]余达淮,金姿姣.数字经济视阈下平台企业经济伦理探索[J].河南社会科学,2021,(02):11-17.
- [14]程恩富,王爱华.数字平台经济垄断的基本特征、内在逻辑与规制思路[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5):1-10.
- [15]许丽.电商平台“二选一”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J].中国流通经济,2022,(04):43-55.
- [16]朱建海.“大数据杀熟”反垄断规制的理论证成与路径优化[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112-121.
- [17]余少祥.平台经济劳动者保护的法理逻辑与路径选择[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20):44-54.
- [18]王伟进,王天玉,冯文猛.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用工的劳动保护和劳动关系治理[J].行政管理改革,2022,(02):52-60.
- [19]吴飞.数字平台的伦理困境与系统性治理[J].国家治理,2022,(07):22-25
- [20]程雪军,侯姝琦.互联网平台数据垄断的规制困境与治理机制[J].电子政务,2023,(03):2-18.
- [21]张元钊,李鸿阶.我国互联网平台垄断现象、机理与治理思路[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07):72-84.

[2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3/c88-10757.html>.

[23] 刘洋,刘欢.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及其法律规制[J].学术交流,2023,(02):76-87.

[24] 崔维维.平台运作逻辑的政治伦理风险[J].河南社会科学,2022,(12):42-50.

[25] 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 415-426

[26] 宋冬林,田广辉.平台经济中数据垄断的根源、途径与治理策略[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1):104-114.

[27] 任保平.数字经济背景下增长要素扩展驱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3,(01):5-13.

[28] 李震.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理论基础、挑战和应对[J].社会科学,2022,(03):43-53.

[29] 王宁,胡乐明.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2,(05):20-35.

[30]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21-10-20.

(责任编辑:路春城)

Research on the Emergence, Reason and Corrective Measures of Platform Ethics

TANG Renwu, MA Zhidong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its position and rol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re are a series of platform ethical issues such as platform monopoly, data security, platform exploitation, digital divide, harmful anti intellectual remarks, and Baumol's disease, which erod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from the industry level, institutional level, participant level, and technical level, and have great harm to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platform ethics is due to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industry, system, participants, and technolog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promote self-discipline and autonomy in the platform industry, improve the platform governance system,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latform participants, accelerate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latform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Key words: platform ethics; digital economy; data security; data monopoly